

70 年前,那场“生动鲜活”的文艺座谈会

早报记者 田波澜

1942 年 5 月 2 日、16 日、23 日,延安文艺座谈会在杨家岭先后分三次举行。毛泽东在 5 月 2 日第一次大会上发表了“引言”讲话,在 5 月 23 日第三次大会上作了“结论”讲话,这两次讲话的文字整理稿于 1943 年 10 月 19 日在《解放日报》正式发表,合称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成为革命文艺理论的一个经典文本,并成为党指导文艺工作的基本方针。今年正值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 70 周年,早报记者就此主题专访延安史专家朱鸿召,以尽可能原汁原味重现这次座谈会的前因后果,以供读者参考。

延安曾经是文化人的

“天堂”“圣地”

东方早报:“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成天有从各个方向走来的青年,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走进这城门。学习、歌唱,过着紧张的快活的日子。”1938 年诗人何其芳到延安两个月后会这样描绘延安。座谈会召开前夕的延安是怎样一种情景?延安文艺界、延安文人的状况如何?

朱鸿召:中共中央在延安前后 10 年,从 1937 年 1 月 13 日进驻延安和平接管,到 1947 年 3 月主动撤出延安城。以 1942 年为界限,此前是青年知识分子称颂延安为“天堂”,此后主要是陕甘宁边区农民歌颂延安是“天堂”。这是两个社会群体用不同的方式来称颂延安以及陕甘宁边区是“赤脚天堂”和“人间福地”。

1936 年 12 月“西安事变”发生后,国共二次合作,建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当时东北、华北、华东沿海一些大城市相继沦陷,大量青年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往西北、西南撤退。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的陈云提出一个建议“抢夺人才就是抢夺天下”,这个主张被采纳,中共通过设在全国一些主要大城市的八路军办事处,以招生的名义广泛招揽人才。抗战前国民政府所属大专以上学校在校学生人数大概有 5 万多,经历大迁徙后,实际复校的只有近 3 万人,流失掉的近 2 万人中差不多有百分之七八十都是到延安去了。

截至 1941 年底、1942 年初,延安大约有五万公家人,办有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中国女子大学、延安自然科学学院、军事学院、马列学院、中国医科大学、民族学院、农学院等 30 多所窑洞大学,编辑出版六七十种报纸杂志,有近 10 家出版机构,10 多家书店。从某种意义上讲,那时的延安是中国最时尚之地,就像我们 1980 年代到深圳,1990 年代到上海一样。

共产党当时要把陕甘宁边区创建成抗日民主示范区,提倡自由研究,优待知识分子,所以像蔡若虹到延安以后就称颂这是“赤脚的天堂”,物质生活虽然贫乏,但在精神生活上是天堂。首先,延安革命队伍里物质生活供给制,大家衣食无忧。其次,革命队伍里官兵平等,比如为什么不清楚都有哪些人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就是当时很多人知道毛泽东在 5 月 23 日要做结论讲话,不是会议代表的也可以去听会。再次,社会风气非常清明,真正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那时《解放日报》报眼位置经常会有失物招领,招领骡子、马、钢笔……当时整个延安城是歌声的海洋,不仅唱歌,还创作歌曲,比如《生产大合唱》、《八路军进行曲》、《黄河大合唱》等,唱出了那个时代的最强音和最高音。另外,整个延安革命队伍上上下下掀起学习之风,图书资源有限,大家就抄书,整本整本地抄,像《安娜·卡列尼娜》这样的长篇小说他们都抄。那时也很开放,在延安的图书馆或资料室可以看到国统区出版的几乎所有报纸杂志。对外交往相对自由,延安的作家可以把文章投递到外面的报刊上发表,比如萧乾主持的香港《大公报》副刊,就刊发了很多

延安作家投递过去的文章。延安高校开展的辩论赛很多也很热烈，辩论题目完全开放，比如国民党是抗日的还是不抗日、国共统一战线前途怎样，等等。那确实是一个非常令人振奋的时代，一个令人神往的地方，在当时就被称为“革命圣地”。长期在延安生活过的人，直到晚年，他们对于延安天堂般的记忆都是印象深刻的。

东方早报：毛泽东为什么要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他发表讲话主要是出于哪些方面的考虑？

朱鸿召：毛泽东主要是认为要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必须要把“枪杆子”和“笔杆子”这两支队伍结合起来。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就是为了促使“枪杆子”和“笔杆子”更好地结合起来，步调一致形成合力，以提高革命队伍的执行力和战斗力。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之前，按照当时党内分工，张闻天以中央总书记身份兼任中央宣传部部长，分管宣传文化教育工作，毛泽东分管军事、外交工作。此间，毛泽东也热心参加一些文艺活动，但主要是出于个人爱好，或集体政治活动的组织需要；毛泽东也对文艺界发表过一些讲话，但仅代表个人。比如1940年1月召开的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张闻天作“文化政策报告”《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而毛泽东是作了题为《论新民主主义政治与新民主主义文化》（即《新民主主义论》）的“演讲”，不代表组织决议。当时指导延安文艺政策的主要是张闻天的这个报告，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一系列规章制度。

这个情况是什么时候改变的呢？在1941年9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正式提出要对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思想路线、组织路线进行清理，张闻天、博古马上作了检讨，只有王明不认账。随后王明病倒了，到1942年1月中上旬，张闻天组织带领“延安农村工作调查团”离开延安下乡了，周恩来此时则在重庆，高层的路线清理就无法开展。怎么办？毛泽东就把整风运动由党内高层的思想路线斗争，扩展为全党的一次思想教育运动。

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本来是张闻天分管的宣传文化教育工作，出现了文人和文人之间的纷争以及文人和将军之间的矛盾。当时聚集在延安的文化人，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两个阵营、三大系统、四个山头”。所谓“两个阵营”，就是“鲁艺”和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简称“文抗”）。延安有成就的文艺家主要集中在这两个单位，但这两个单位之间，以及其内部的文艺家们却成见很深，他们中的很多矛盾源头可以上溯到上海“左联”时期。所谓“三大系统”，是指中共中央文委系统、陕甘宁边区文化系统和部队文艺系统，文艺观点上可以隶属于两大阵营。所谓“四个山头”，是指“鲁艺”、“文抗”、青年艺术剧院和陕甘宁边区文协，后者主要是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这四个文艺团体在当时的延安都有自己独特的工作作风和艺术风格。

早在1940年“鲁艺”学制转向正规化，刚刚开始搞提高的时候，民众剧团团长柯仲平就对鲁艺的人说：“你们搞的是什么提高，那是‘关门提高’。”青年艺术剧院排演曹禺话剧《雷雨》，邀请“鲁艺”的人去观看，看完后谈意见。孰料“鲁艺”的老师们故意不说好的，找了一大堆批评的、否定的意见。事后，青年艺术剧院的吴雪总结说：“我们是将门打开，让别人打屁股来了。”

不同文艺观点和审美态度之间，经常发生批评和争论，就引起文化人之间的矛盾纠结。

另外，艾青与何其芳“交恶”，与刘白羽冷漠，与李又然嫌隙，与萧军冲突；张仃与蔡若虹有矛盾；萧军与丁玲争吵，与欧阳山对质，与艾思奇有过齟齬，称萧三为“俄国贩子”，称何其芳为“左倾幼稚病”，认为刘雪苇是“形式主义”……不一而足。这些文人相轻，矛盾纷争，任性使气，在没有政治运动因素搅和之前，应该讲是无伤大雅的，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文艺繁荣热闹的一种表现形式。

引起毛泽东关注的首先是文人之间的纷争。在这场纷争中，萧军非常激进，他的血性燃点比较低，他觉得找艾思奇不能解决问题，到张闻天那里也不能解决问题，于是转而寻找毛泽东。加之张闻天带队下乡离开延安一年多，此时党的宣传文化工作最高领导岗位空缺了。所以，毛泽东约请老朋友萧三谈话时说：“我本来不管文艺的，现在文艺的问题碰到鼻子上来了，不能不管一下。”

引起毛泽东更大关注的，是新知识分子在延安报刊上发表文章公开批评革命队伍中的一些不

合理现象，激起部分将军们的不满。

此外，还有丁玲的小说《在医院中时》（1941年11月），揭示了初到延安的知识青年与环境的矛盾和冲突；莫耶的小说《丽萍的烦恼》（1942年3月），描写一位知识女性嫁给一位工农干部后，因为人生观念和生活习惯的差异而冲突不断，都引起人们的争议。

小说是曲笔，姑且可以用虚构创作来抵挡对号入座者的恼怒和指责。到1942年3月，《解放日报》连续发表犀利的批判性杂文，文艺家们直接对延安革命队伍里存在的不合理现象进行批判，更加激起了部分高级将领的震怒，并抗议到毛泽东面前。这些杂文包括艾青《了解作家，尊重作家》（1942年3月）、罗烽《还是杂文时代》（1942年3月）、萧军《论“终身大事”》（1942年3月）、草明《希特勒的自画像》（1942年3月）、萧军《论同志之“爱”与“耐”》（1942年4月）、《续论“终身大事”》（1942年5月）、《杂文还废不得说》（1942年5月），等等。其中，引起最大反响的是丁玲的《三八节有感》（1942年3月9日）和王实味的《野百合花》（1942年3月13日、23日）。

这时毛泽东觉得他必须出面来化解这个矛盾。如何化解？毛泽东在这个问题处理上是非常讲究策略的，他没有简单地用组织或者命令的方式来处理，而是召开一个座谈会。

据王首道回忆，《野百合花》1942年3月分两次在《解放日报》发表，毛泽东读过后说：“这是王实味挂帅了，不是马克思主义挂帅。”同年3月31日，毛泽东在《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上讲话：“关于整顿三风问题，各部门已开始热烈讨论，这是很好的现象。但也有些人是从不正确的立场说话的，这就是绝对平均主义的观念和冷嘲暗箭的办法。”随后，4月初的一次高级干部学习会上，许多人都对《三八节有感》和《野百合花》提出批评。毛泽东最后说：“《三八节有感》虽然有批评，但还有建议。丁玲与王实味也不同，丁玲是同志，王实味是托派。”文艺整风期间，只有个别单位在墙报上或小组讨论中对《三八节有感》有批评。而批判王实味的斗争，却因此从文艺思想上升为政治斗争。4月3日，中宣部做出《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即第一个“四三决定”，开始对整风运动初期发动群众检举揭发本单位本部门领导问题，转变为把整风运动放置在本单位领导的掌控之下的“纠偏”阶段。

延安文艺座谈会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召开的，将文艺问题放到政治立场和阶级斗争上去考察对待，其形式是轻松自由的座谈会，其实质是文艺界整风运动的一项重要内容。

所以，相对于1940年1月召开的陕甘宁边区文协代表大会和1944年10月召开的陕甘宁边区文教代表大会而言，1942年5月召开的这次延安文艺座谈会，属于一次非正式会议。

一次关于文化工作的

非正式会议

东方早报：召开会议发表讲话前，毛泽东对文艺政策问题的考虑是否已成熟？毛泽东为召开座谈会都做了哪些准备？座谈会之前，毛泽东广泛地约请延安文艺界人士谈话，调查情况，收集意见。当时主要有哪些意见？这些意见对毛后来发表讲话有何影响？

朱鸿召：从毛泽东对这个会议的筹备，到会议召开以及会议结束一年多以后才发表讲话文本，能够看出开会之前毛泽东对革命文艺政策并没有思考得非常成熟、有了固定的结论，所以为什么是座谈会，座谈会就是一个开放的会议，让大家充分发表意见的。

毛泽东为开这个会作了充分准备。一是现实的准备，毛泽东有意识地约请了将近三四十位知名作家、艺术家谈话，征询他们对文艺问题的意见。约请谈话的对象分两种，一种是党内作家，对党内作家他基本上是把人叫到他的住处去谈；另一种是党外比较知名的作家，对于这个群体他往往是亲自登门拜访谈话。谈话氛围非常宽松，凡是约请过来谈话的基本上都留人吃饭。他收集了大量的文艺方面的问题以及各种各样的文艺观点，比如文艺和政治的关系应该怎样、文艺跟阶级之间是什么关系、文艺作家应该怎样对待理论学习等等，作家们所谈的问题方方面面都有，甚至具体到作家要不要上早操、怎样出书发表文章。

二是理论的准备，毛泽东当时主要委托博古翻译了苏联的一系列文艺政策。翻译原文源自王

明 1937 年 12 月从苏联带回的 14 箱书，博古从这些书中挑选然后组织翻译。座谈会期间，作为《解放日报》社长的博古组织《解放日报》特设“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专栏，选译列宁《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恩格斯《论现实主义》、列宁《论文学》以及鲁迅《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等经典文章，分别在 5 月 14 日、15 日、20 日分三次刊出，配合座谈会的召开，也为会议代表的讨论学习提供理论材料。发表这一组文章的意义，就是要参照苏联的经验，将文学艺术当作革命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通过文艺界整风运动，使之成为革命这架机器上的“齿轮与螺丝钉”。

东方早报：1942 年 4 月 27 日，毛泽东约周扬、李伯钊一起拟定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的代表名单，然后以毛泽东和凯丰（时任中宣部代理部长）的名义，发出正式请柬。为什么是请柬而不是通知？为什么由毛泽东和凯丰共同署名？后来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的主要是什么人？

朱鸿召：因为这是一次非正式会议，是文艺界座谈、讨论、交流的会议。请柬上写着：“为着交换对于目前文艺运动各方面问题的意见起见，特定于 5 月 2 日下午一时半在杨家岭办公厅楼下会议室内开座谈会，敬希届时出席为盼。”落款为：毛泽东、凯丰。请柬是以个人名义发出的，会议不是以组织的名义召开。

这是一次非正式会议，既有它的客观原因，同时也是毛泽东解决文艺问题的一种策略所在。因为召开这个会议需要解决的最大问题，就是把革命队伍里那一部分最有个性、最追求个性的，往往是特立独行的人整合到革命队伍中来，用强制的办法肯定行不通，所以用这种非正式的开放式的会议形式。

会议虽是以毛泽东的个人名义召开，但其背后代表着一种组织行为。1942 年 4 月 10 日，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正式提议并获准通过关于召开文艺座谈会的决定，准备以毛泽东、博古、凯丰的名义召集这个座谈会，拟就作家立场、文艺政策、文体与作风、文艺对象、文艺题材等问题交换意见。后来，因为博古忙于其他工作，没有参加座谈会的具体会务筹备工作，所以座谈会是以书记处书记毛泽东和中宣部代部长凯丰的名义召开，请柬上也就署了他们两个人的名字。

值得注意的是，书记处工作会议上拟定的文艺座谈会的五个议题，都是就文艺谈文艺的问题，是文艺本身的议题，但到实际开会的时候变成了六个议题：文艺立场、文艺态度、文艺对象、文艺素材、文艺工作和学习问题，从解决文艺自身的问题扩大为包括文艺和政治的问题，文艺和整个革命队伍的问题。

参加文艺座谈会的正式代表大概有 110 人左右，确切的数字现在统计不到，因为当时有收到了请柬，人在前线，赶不回来的；也有收到请柬拒绝参加的，比如高长虹，他认为自己到延安要放弃文学，研究经济；还有没有收到请柬自己跑去旁听的，如方纪、郭小川就是。而且会议分三次召开，每次到会的人都不确切，有的人参加了前边的两次会，第三次会没有参加，像吴亮平、吴奚如。所以参加合影的 100 余人并不一定就是会议全部代表，因为这是第三次会议的合影。

收到请柬的正式代表，一是当时就已比较有成就的文艺工作者，这个文艺是大文艺，除了诗歌、散文、小说、美术、音乐之外，新闻出版、图书发行也都有代表参加。比如《解放日报》美术部主任张谔，《边区群众报》总编辑胡继伟。二是中央有关领导，比如朱德、康生、徐特立等。

解决最棘手的

思想立场问题

东方早报：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激烈争论》中说“在杨家岭召开的延安文艺座谈会，曾经是个很生动鲜活的会议”，这跟后人记述的印象很不一样，从什么样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生动鲜活的会议”？

朱鸿召：这个会议内容是包容的，形式是开放的，气氛是活跃的，确实开得生动鲜活。座谈会分三次召开，提出问题，广泛讨论，归纳总结。这是一次名符其实的座谈会、讨论会，与会者围绕文艺的立场、态度、对象、材料、生活、学习等六个问题，先后有 40 多人发表意见，相互争论，畅所欲言。毛泽东作主旨讲话和最后总结，也是以平等的身份，商量探讨的语气进行的。

5月2日下午，在杨家岭中央办公厅小洋楼一楼会议室，召开第一次会议。会场没有悬挂会标横幅，主席台就是一张普通的条桌，毛泽东、朱德、凯丰坐在主席台条桌边。会议由凯丰主持，凯丰宣布会议开始，请毛泽东发表主旨讲话（即后来公开发表的正式文本“引言”部分）。毛泽东很风趣地说，在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有两支军队，一支是朱（德）总司令的，一支是鲁（迅）总司令的。要取得革命的胜利，这两支队伍必须团结合作，协同作战。“今天邀集大家来开座谈会，目的是要和大家交换意见，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中间的正确关系，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求得革命文艺对于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协助，藉以打倒我们的民族敌人，完成民族解放任务。”开宗明义，会议形式是座谈讨论，主要内容是文艺工作与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会议召开的目的，“就是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为此，提出六个问题当作引子，希望大家在这些问题及其他有关的问题上发表意见。

毛泽东主旨讲话后，与会代表开始讨论。一时有些冷场，毛泽东看看丁玲，实际上是想让丁玲先讲。丁玲也最有资格先讲，她是第一个到达陕北的知名文人，在延安文化人中她的知名度和文学成就也都是最高的。但丁玲是个非常精明的人，她说：“萧军，你是学炮兵的，你就第一个开炮吧！”萧军从座位上站起来，他是个很容易冲动的人，习惯性地捋了捋衣袖，第一个发言，足足讲了约三刻钟。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对于每个问题，我给了自己的说明，同时阐明了政治、军事、文化应该如何彼此接近和理解。”毛泽东一边听，一边记，有时点头，有时淡淡一笑。萧军讲过以后，大家一下子就愣住了，又是冷场。这时，担任毛泽东秘书的胡乔木站起来反驳：“文艺界需要有组织，鲁迅当年没有受到组织的领导是不足，不是他的光荣。归根到底，是党要不要领导文艺，能不能领导文艺的问题。”萧军毫不示弱，马上回应，双方当场就争执起来。两个回合后，胡乔木照顾大局，没有再接茬，而是让更多的人发表意见。

看到双方争得不可开交，时任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主任的欧阳山是研究文艺理论的，觉得自己有责任给大家阐述清楚一些文学艺术的基本概念和范畴，避免不必要的无谓争吵，让大家站在同一个认识平台上进行交流。于是，他主动发言，从什么是文学艺术讲起，讲文学艺术的基本原理，谈到文学现实主义、阶级性、形象性、典型性等一系列问题。开始人们还静静地听着，慢慢地会场上就出现了窃窃私语，大约占了近一个小时后，就有人高声起哄：“主席，我们这里不是开训练班！”“他大概是怕我们中央的同志不了解文学概论，来上课的。”于是欧阳山就被轰下了场。

鲁艺音乐系教师向隅，发言批评某人有宗派主义，说自己提交入党申请已经有三年了，至今都没有得到解决。坐在一边的当事人没有马上应答。在这次会议上发言的还有李伯钊、何其芳、艾青、吴亮平等。何其芳曾经以《画梦录》获得1936年度《大公报》文艺奖，是位温情脉脉的诗人，1938年8月到延安后，扔掉了忧郁感伤的调子，换上一副高亢明亮的歌喉。他发言说：“听了主席刚才的教诲，我很受启发。小资产阶级的灵魂是不干净的，他们自私自利、怯懦、脆弱、动摇。我感觉到自己迫切地需要改造。”他的发言，赢得了毛泽东会心的一笑。

东方早报：那么，第二次会议情况是怎样的呢？

朱鸿召：5月16日第二次会议，全天讨论，也是争吵得最激烈的一次。毛泽东始终在边听边记，偶尔插话，没有正式讲话。丁玲首先发言，结合自己在主编《解放日报》文艺栏时的工作，谈对作家立场问题的认识，表示“我虽然参加革命时间也不短了，但是从世界观上来说，还应该脱胎换骨”。

曾经是“创造社”“狂飙社”成员，到延安后长期率领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在各地乡村巡回演出的柯仲平，介绍该团坚持走通俗化道路，在边区巡回演出大受欢迎的情况。在延安文艺界热衷表演大戏、“关门提高”受到批评的舆论环境里，他颇为得意地说：“这两年在演大戏的过程中，好些人把给老百姓看的小戏给忘了，我们民众剧团就是演《小放牛》。你们瞧不起《小放牛》吗？老百姓却很喜欢。剧团离开村庄时，群众都恋恋不舍地把我们送得好远，并送给很多慰问品。你

们要在哪些地方找到我们剧团？怎么找呢？你们只要顺着鸡蛋壳、花生壳、水果皮、红枣核多的道路走，就可以找到。老百姓慰劳我们的鸡蛋、花生、水果、红枣，我们吃不完，装满了我们的衣袋、行囊和马褡。”他那种洋洋得意的神情，逗得会场上许多人都哈哈大笑。毛泽东也乐了，插了一句：你们吃了群众慰劳的鸡蛋，就要更好地为群众服务，要拿出更好的节目来为群众演出，不要骄傲自满。你们如果老是《小放牛》，就没有鸡蛋吃了。

接着，是八路军一二〇师“战斗剧社”社长欧阳山尊发言，建议加强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和动员作家艺术家们到实际斗争中去，到抗日的前线上去。

“鲁艺”音乐系教员张贞麒，发言中希望延安重视乐器生产工作。

第二次会议上引起争论的焦点人物，仍然是萧军。他继上次会议发言大走调后，又尖锐地指出：你们共产党现在又开文艺座谈会，又在整风。你们现在整“三风”，将来总有一天会整“六风”。你们为什么不在十年以前就提出来呢？他的意思是说，你们早就应该整了，而且还要整得厉害一点，但这样整风能不能整得好，他表示怀疑。此前，他在与毛泽东的频繁交往过程中，毛泽东曾经动员过他申请入党，但他拒绝了，他表示自己个性太强，与贵党的组织纪律性难以相容，还是在党外自在些。

这种更尖锐的言论，激起胡乔木、吴亮平、李又常、李雷、罗烽、郑景康等人的回应，或针锋相对地反驳，或旗帜鲜明地赞同。这次讨论会开得非常活跃，会场上笑声、掌声、争吵声不断。讲完之后，也没有任何人追究责任，真正是做到了文艺方面的事情，由文艺界自己来讨论解决，不带任何强逼的性质，发扬艺术民主。

有人提出文艺的基本出发点是人类之爱；有人认为人性是文艺的永恒主题；有人说还是杂文时代，需要鲁迅笔法；有人提出文艺和政治都是为人民大众谋福利，为大多数的劳苦的人类而奋斗，彼此殊途同归；有人说学习马列主义辩证法，老是觉得影响创作情绪……

“鲁艺”戏剧系主任张庚在发言中直言不讳地说：我不赞成主席的有些意见，提高是非常必要的，我们共产党的文化运动搞了那么多年，难道不要提高吗？因此，他主张普及与提高来个分工，像文工团、演出队，去做普及工作；像鲁艺这样的学府，能不能主要去做提高的工作呢？

周扬发言时，明确维护毛泽东的观点。

东方早报：再请介绍一下第三次会议的情况。

朱鸿召：5月23日，第三次会议，从下午开始继续讨论，临近结尾时，朱德再次发言。他不点名地批评萧军的观点，然后现身说法，参加革命，思想就要有转变。“岂但转变，我说就是投降。就拿我来说，也一样。我是一个从旧军人出身的人，我原来不是无产阶级，因为无产阶级代表的是真理，我就投降了无产阶级。我投降无产阶级，并不是想来当总司令。我只是替无产阶级打仗、拼命、做事。后来仗打多了，事情做久了，大家就推我做总司令。”针对歌颂与暴露的争论，他说：“共产党、八路军，就是有功有德，为什么不该歌，不该颂呢？”平时和蔼可亲的朱德，这次发言却颇有些疾言厉色。他用通俗的大白话，一语道破了文艺界整风的实质，就是要实现知识分子和文学艺术家由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工农兵大众的根本转变。

下午发言讨论到朱德为止，晚饭前担任摄影的吴印咸招呼大家到礼堂外边合影留念。前边一排小马扎，后边放着几排长条板凳，中间再站上一排，一百余人的合影照就这么随便站，随便坐。没有领导群众之分，谁愿意坐前排中央位置都可以。现在前排当中紧挨毛泽东右边的是鲁艺文工团演员田方，他当时回家对妻子于蓝讲：“闭幕前宣布毛主席和大家一起拍照留念，大家高兴得鼓起掌来。但是，很多同志都那么谦虚，不好意思靠近毛主席去坐。我不怕，我就要坐在毛主席身旁！”

前排左起第七人的刘白羽，大个子，身量重，不小心一下子就把小马扎给压塌了，仰面朝天，引得大家一阵哄笑，眼光都转向他。自己带相机站在一旁的郑景康，按下快门，抢拍下这个场面，留下座谈会合影照的另外一个版本。毛泽东作“结论”讲话，是在晚饭后。因为大家事先都知道毛泽东要作结论讲话，所以这天会场爆满。考虑到人太多，临时将会议移至中央办公楼外边的

空地上，支起一盏煤气灯照明。

据参加会议的姚时晓回忆，吃晚饭的时候，毛泽东还坐在自己窑洞前的石桌旁对讲话提纲作删改。罗工柳回忆，他个子小，当时就席地坐在临时放置的小讲桌旁边，听到毛泽东拿出提纲讲稿的时候，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话：“哎呀，这个文章难做啊！”

毛泽东作结论报告时，会场静悄悄的，毛泽东说：“同志们，座谈会开了三次，开得很好。可惜座位太少了，下次多做几把椅子，请你们来坐。我对文艺是小学生，是门外汉，向同志们学习了很多。前两次是我出题目，大家做文章。今天是考我一考，大家出题目，要我做文章。题目就叫‘结论’。”然后，他接着说：“朱总司令讲得很好，他已经作了结论。中央的意见是一致的，有些问题我再讲一点。什么是我们的中心问题呢？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如何为群众的问题。我的结论就以这两个问题为中心……”

这段话没有写入后来公开发表的正式文本，从中透露了召开这次座谈会，不是毛泽东个人的偶然行为，而是经过中央政治局集体讨论通过的决定，是延安整风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除了前述4月10日召开的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在5月21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就文艺座谈会的结论报告作了汇报。会议同意毛泽东对于延安文艺界存在的偏向问题、党的文艺政策的基本方针是为群众和如何为群众的问题等意见。

毛泽东把这次座谈会讨论的所有问题，归结为一个中心，就是革命文艺“为群众与如何为群众的问题”，又称“文艺是为什么人的”与“如何为”的问题。然后，针对发言讨论中提出的各种观点，普及与提高的关系、文艺与生活的关系、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文艺批评中的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的问题，以及“人性论”、“人类之爱”、“杂文时代”、“鲁迅笔法”、“歌功颂德”、“暴露黑暗”等等，一一作出解答。最后亮明表态：“我们延安文艺界中存在上述种种问题，这是说明一个什么事实呢？说明这样一个事实，就是文艺界中还严重地存在着三风不正的东西，同志们中间还有唯心论、洋教条、空想、空谈、轻视实践、脱离群众等等的缺点，需要一个切实的严肃的整风运动。”所谓“三风不正”，是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讲话《整顿党的作风》，发动全面整风运动时提出的革命队伍里存在着的学风、党风、文风问题，主张“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他在文艺座谈会上再次强调，要在文艺界开展整风运动，由此带来用群众运动的方式解决作家的立场、观点问题。

毛泽东在座谈会上的两次讲话，事先只有一个提纲。后来公开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正式文本，是由胡乔木根据自己的会议笔记，并参照中央办公厅安排的四位会场速记员轮班记录稿整理而成，经过毛泽东本人修改审阅，距离座谈会结束一年多以后，于1943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七周年纪念日，在延安《解放日报》上以两个整版加一个半版的超常规篇幅全文发表。同时，采用通改报版的办法，以解放社的名义出版32开本的铅印单行本。1953年4月，中共中央编辑出版的《毛泽东选集》在第3卷收入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文本，它和1943年最初发表的文本相比，在篇幅、内容、文字方面进行了266处修改，其中删掉原文92处，增补文字91处，修饰文字83处。

《解放日报》发表的最初文本和座谈会现场讲话相比，也有比较大的出入。应该说它是有会议现场记录依据的，但距座谈会结束已过去了一年多时间，在这一年多里整风运动从前期学习运动发展到审干运动、抢救运动，人们的观念变化非常大，到后来基本是一边倒，认为在战争的环境下，应该是“笔杆子”为“枪杆子”服务。所以座谈会上很多话没有讲得那么绝对，到作为正式文本发表时，有些东西有出入，另外也规范化了。比如毛泽东说，有两支军队，一支是朱总司令的，一支是鲁总司令的，后来正式发表的文本中改为“有文武两个战线，这就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手里拿枪的军队”和“文化的军队”。所以到最后形成文本时，很多观点很多结论是超出了会议讨论范畴的。

产生了意想不到的

历史影响

东方早报：座谈会结束后延安文艺界有什么变化？

朱鸿召：座谈会结束后，延安文化人全部参加整风审干抢救运动，文艺界经过短暂的沉寂阶段，几乎所有报纸杂志都停办了，只留下《解放日报》、《边区群众报》和特供高级领导的《参考消息》。1942年6月，中央研究院批判王实味的斗争出现一边倒的现象。同年9月，毛泽东亲自出面为《解放日报》综合文艺栏约稿，以缓解严重稿荒问题。随着大生产运动的开展，“文抗”、“鲁艺”的作家、艺术家们纷纷离开窑洞，下农村，进工厂，到军营，参加大生产运动，劳动成为一个时代的文艺主题和审美倾向。丁玲又像上前线一样，打背包，裹绑腿，到柳林乡同老乡们一起纺线，改革纺车，帮助盲艺人韩起祥创作新节目，学习柯仲平、马健翎的“民众剧团”创作的民族化、大众化的经验，采访许多先进人物。艾青来到吴家枣园找到劳动英雄吴满有，吃住在庄上，将写作的长诗《吴满有》念给这位主人公听，直到对方点头称是。萧军一度辞去公职，带着老婆孩子跑到农村当农民。何其芳到重庆宣传延安文艺座谈会精神，回延安后，又到河北平山县农村参加土改。1943年春节，鲁艺宣传队率先演出新式秧歌，逐渐用革命意识改造传统民间歌唱，将陕甘宁边区农民们的生活幸福感升华为崭新的艺术形式——秧歌舞、秧歌剧，如《兄妹开荒》、《夫妻识字》、《白毛女》等等，从此创造了延安革命文艺的新形式、新人物，也开创了延安革命文艺的另一个大繁荣时代。

东方早报：这个会议有着怎样的意义和影响？

这个会议解决了当时最棘手的一个问题，对那些最个性张扬、特立独行、自由散漫的文化人进行了思想改造，将本来游离在革命队伍边缘的这些人编制到革命队伍这个组织机器里面来，使其真正转变为无产阶级革命队伍里的文艺战士，从而提高了革命队伍的绝对执行力。

这个会议产生了意想不到的社会历史影响。你把它放在整个中国文化的进程来看，而不局限于20世纪，它是什么呢？在此之前，我们中国社会治理结构是“道统”、“文统”和“政统”三统分立，相互制约，而从这个会议开始实现了“道统”、“文统”归并于“政统”。在当时来讲是非常有必要的，战争环境下革命队伍服从命令听指挥，“理解了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经过延安整风运动，极大地锻造了革命队伍的执行力和战斗力，为抗战胜利后共产党推翻国民党政权，提供了直接的组织保障和思想保障。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可以齐心协力地办大事，我们这个社会治理结构具有非常强大的效率，也跟它直接相关。但另一方面它也有负面作用，因为它后来教条化后，从根本上对知识分子进行人生改造，让知识分子放弃原有的独立意志、自由精神，其想像力和创造力就受到了制约，影响到创造精神。这两方面的影响到今天也都存在。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现实难题，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历史选择。在战争环境下，那代人选择以政治方式来解决文艺问题，我觉得无可厚非。随着环境的变化，肯定是要做一些调整和取舍的。比如1979年第四次文代会上，邓小平提出：我们今天环境改变了，我们不再提文艺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因为那是战争环境下的观点，在今天已狭隘了，我们提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现在和改革开放之初的那个时代又完全不同了，我们经过30多年的改革发展，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现代化只能是一种手段，不是目的本身。我们必须面对一个崭新的世界环境，在人类文明进程的主要方面和关键领域，能够提出让所有人都乐于接受，并共同获益的价值主张。

文艺座谈会本身不存在所谓抓小辫子、打棍子，但问题是后来形成了阶级观念，就导致了题材决定论、写作方法决定论。比如1942年11月13日，《解放日报》发表刘芝明题为《虎·狮与封建文艺》的文章，认为老虎和狮子是封建统治意识形象化的典型，因为老虎和狮子总是坐在地主庄园家的门口，马是革命的、进步的交通工具，代表文明。对老虎、狮子和马都能够作出进步与落后、文明与野蛮、不同阶级的区分，那么再往前延伸一步，就可以对春花秋月、青山绿水、草木虫鱼、世间万物都做出革命、不革命和反革命的分界，这就太狭隘了。

所以这个座谈会本身是开放的，但其背后所依托的整风抢救运动是对作家、文化人、知识分子进行彻底的思想改造。到了后来，遗风所及，一种机械的、片面的、绝对的阶级观念就成为沉

重的思想包袱。而判断文学艺术作品价值的标准，在于该作品有没有提供此前人类文学史上或者文化史上没有提供的东西，就是生命的深度和广度，思想的高度和厚度，以及新的艺术形式和手法等。如果我们不能从这种狭隘的文学观念中走出来，我们的文学艺术就将自我边缘于世界文坛，我们的文化创造能力就难以得到真正提高。

东方早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怎样在延安传播开来的？又如何传播到国统区？引起了怎样的反响？毛和当时的中共又是如何回应知识界和政治界的反响的？

朱鸿召：讲话传播出去分三个层级。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讲话于1943年10月19日在《解放日报》全文发表后，第二天延安整风运动最高领导机构——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发出通知，将《讲话》列入整风必读文件，要求干部和党员进行深刻的学习和研究，规定为今后干部学校与在职干部必修的一课。两周后，11月7日，中宣部发布《关于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决定》，将《讲话》直接当作党的文艺工作方针政策，是判断一切文艺作品和文艺主张的准绳。并且，“毛泽东同志讲话的全部精神，同样适用于一切文化部门，也同样适用于党的一切工作部门。”

在国统区，1943年以后，何其芳和刘白羽受派从延安到重庆去传达，先是在中共地下党的党员作家家里面，然后用重庆《新华日报》的阵地向整个作家群体传达延安文艺座谈会的精神。因为大批的作家在香港，还派人到香港去传达，组织开展关于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宣传。这样通过组织的方式，把延安文艺座谈会结束一年多以后文本化的“讲话”以先党内后党外的形式全部执行下去。

其最大的影响就是提高了革命队伍的绝对执行力和战斗力。在重庆，郭沫若认真阅读后，认为它“有经有权”，既有可以成为真理的基本原则，也有一些属于特定历史环境下的权宜之计。后来这话传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很认可这个评价。

朱鸿召简介

朱鸿召，1965年生，1988年获华东师范大学文学硕士学位，1998年获文学博士学位，延安大学中文系特聘教授，主要从事抗战时期延安社会历史文化研究和现代城市文化研究，相关著述有《延安文人》（《延河边的文人们》）、《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延安曾经是天堂》，相关编译有《众说纷纭话延安》、《延安访问记》、《王实味文存》、《博古，39岁的辉煌与悲壮》、《圣地不再遥远》等。2002年应邀为CCTV大型专题节目《延安，温故1942——纪念延安文艺座谈会60周年》总撰稿；2011年应邀为12集大型人文纪录片《我们在延安》（Days In Yanan）总撰稿。